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下)



首席专家 龚育之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 著

MAKESIZHUYIZHONGGUOHUAYANJIU
LISHIJINCHENGHEJIBENJINGYA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经近90个春秋，其间跌宕峰回，波澜壮阔，但贯穿全过程的主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升华，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程，采用“数字化”方式表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二、二、二、三、二”，即分为三个历史时期；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了作为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

ISBN 978-7-5300-0292-6



9 787530 002926

定价：120.00元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下)



首席专家 龚育之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 著

MAKESIZHUYIZHONGGUOHUAYANJIU
LISHIJINCHENGHEJIBENJINGYA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下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著。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5300 - 0292 - 6

I. 马… II. 马…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102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下)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YANJIU

——LISHI JINCHENG HE JIBEN JINGYAN (XIA)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首席专家 龚育之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北京华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48.875 印张 85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0 - 0292 - 6/A · 1

总定价:120.00 元(上下平装)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2008)



导 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改革开放 30 年

1978 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遭遇严重挫折后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我们国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从此开始。这个飞跃与新时期的历史相生相伴，还在继续进行之中。本编结束至 2008 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30 周年之际。对这 30 年的历史分期，既考虑了党的重要会议确定的任务，也考虑了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加以综合把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前（1978—1982）为“拨乱反正，改革起步”阶段。在历史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在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后，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初步形成。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初步启动，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决策，一是允许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二是支持创办经济特区。与此相适应，政治思想方面也有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开始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二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 4 年如邓小平所说，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改革”，初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69 页。

第二，从党的十二大至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前（1982—1992）为“全面改革，治理整顿”阶段。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发展战略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意味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明确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場导向日趋明确。随后，党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形势剧变的严峻考验，实现新老领导集体的交接，一面加强治理整顿，一面加快上海浦东和海南开发。这10年的前5年态势，可谓改革从对内搞活发展到对外开放；后5年的态势，着重治理整顿、协调发展，为经济社会沿着健康方向前进夯实基础。

第三，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年底（1992—2000）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阶段。为什么要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连在一起作为划分两段历史的界碑呢？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面临重要历史关头，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排除干扰，牢牢地把握住航舵，决定我们国家的改革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前进。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抉择。因此，这两个前后相连的重大事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党的十四大初步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后，各个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加快步伐。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制定了改革开放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任务。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起由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任务提前完成，城乡居民生活基本实现总体小康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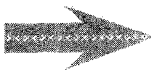
第四，进入新世纪后（2001—2008）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经党的十六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随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格局。

在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以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为重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我们国家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30年是党的近90年历史中发展比较平顺、唯一没有发生大的曲折和挫折的时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点来解读，其最大成就是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从实践层面而言，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层面而言，是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波澜壮阔，绚丽斑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当然，“中国实际”的内涵会愈益丰富，“结合”和“切合”的方法会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会愈走愈宽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将会不断反映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而向前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第一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辟和历史转折的实现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思想解放大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实事求是地观察和思考中国面临的形势和抉择、世界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在中国处于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和推动下，适应中国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趋势，果断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带领人民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进程由此开始。

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历史转折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中央，尤其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革命家的推动下，出现了党的七大、八大以后党的会议上少有的民主气氛。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中心议题开展热烈讨论，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发生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标志。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原本准备讨论经济问题。会议开始确定的议程是：（1）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

件的讨论稿，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2）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是，1978年下半年党和国家形势发生的变化，以及在促成这些变化中邓小平等领导人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使会议原定的议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党内高级干部关注的焦点，还是领导层在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出现的新氛围，都使会议的讨论大大超出原定议题，为新的决策的制定作了重要准备。

会前，邓小平提出适时地结束在全国范围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赞同。华国锋在宣布会议议程时提出：在讨论原定议题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他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把工作重点转移作为关系全局的中心问题，就不能不首先涉及党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很多与会者记得，早在执政之初，党中央就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20多年过去了，这个转变一直未能真正实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从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党执政后的主要任务，直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经济建设一再受到频繁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指导思想的问题，必须首先从思想路线上解决。这就不能不触及长期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不能不触及思想领域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现象，包括半年来对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事实上，尽管党内这时对于工作重点转移的认识比较一致，但对于由此而涉及的指导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却存在不小分歧。

1978年11月11日，会议进入分组讨论后，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但在谈及实现这一转移的指导思想时，有的人只强调，工作重点转移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搞现代化建设仍然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搞四个现代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矛盾”。但很多人认为，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的这个转变，不是具体工作重点的通常性质的转变，而是

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实际已涉及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问题。指导思想的分歧不解决，工作重点的转移就不可能顺利实现。这种分歧，既表现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上，也表现在如何对待广大干部群众要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呼声上。分组讨论一开始，有的发言就涉及这一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是陈云的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1979年起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同时提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提出几个比较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和王鹤寿等人的冤案、彭德怀的冤案、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等。陈云指出：“这些问题在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他还提出康生的错误问题。陈云提出的这几个历史遗留问题，都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发言在会议简报刊登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与会人员畅所欲言，会议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各组发言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除陈云提出的几个问题外，与会者还提出其他一些需要解决的遗留问题。如彭真、杨尚昆等人的错案，所谓“二月逆流”，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报道了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因这一事件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会上的发言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发言中提出的意见也很快被政治局采纳。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上报华国锋并党中央。24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后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25日，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讲话，首先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开得生动活泼。接着，他宣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几条决定：（1）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为所谓“二月逆流”和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3）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4）彭德怀同志对党和人民作过

重大贡献，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5）陶铸同志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6）过去把杨尚昆同志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7）康生和谢富治引起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理的；（8）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华国锋最后讲道：在党的工作着重点即将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郑重地处理上面这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中央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按照这个方针处理好这些问题，就能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对于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培育的我们党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也有重大意义。12月14日，会议秘书组在印发讲话定稿本时，根据会中提出的意见，又增加一条，即“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1975年、1976年下发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撤销。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的这些决定，使两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要求终于得到基本解决。与会人员十分振奋，更加畅所欲言。一些人还进一步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不能说服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不存在。当然，展开讨论和明确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

中央工作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暴露的意见分歧也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人仍然认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提倡怀疑一切，是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方针。这种观点受到多数人的批评。多数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不赞成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人转变了认识，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还要求党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不少与会人员提出，对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当重新认识，澄清糊涂观念。这是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今后除非发生战争，否则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

在讨论两个农业文件时，许多人对文件草案回避严峻的现实，空讲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连续十几年的大丰收”表示强烈不满，指出：现在全国有近两亿人每年口粮在150公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全国人均粮食比1957年还要少。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过去在政策上对农民卡得太死，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挖得太苦了，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错误作怪。有的还分析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提出政社分开主张。对农业学大寨，也有不少人提出异议，指出全国情况千差万别，怎么能都搞成大寨一个模式？大家还提出不少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建议。有的说：不要怕农民富，如果认为农民富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陈云在发言中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天下就大定了……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①这些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央重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也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改写。

在讨论李先念的国务院务虚会总结讲话时，很多人都赞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和我国的香港、台湾怎样迅速发展经济的材料。不少人看后提议：要改变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充分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建设速度；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鼓励外商与我们合办企业。

在讨论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不少与会者赞成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三个转变”方针。同时，对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工作的急于求成倾向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问题也提出批评，希望今后两三年把比例失调的状况大体调整过来，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再不要重犯1958年一哄而起的错误。陈云还提醒大家：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对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根据这些意见，国务院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修改，这对制止两年来急躁冒进的倾向起了良好作用。

会议的讨论还涉及党的建设、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问题。大家结合过去的教训，指出党和国家遭受灾难，主要原因在于党内民主生活、国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36页。

家的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要求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中央书记处，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的建设；尽快制定各种法律，保证宪法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实行。

会议内容大大超出原定议题，会期也超出原定时间。12月13日会议闭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讲话。华国锋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宣布，会后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方针和任务。

叶剑英讲了三条意见：（1）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委员会要有好的领导班子。（2）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人大常委会要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3）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对这样一场革命，许多人准备不足，思想不解放，“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①

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对半年来党内外热烈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总结，批评“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着重强调了解放思想、打破僵化的迫切要求。他说：“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还指出：解放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当前这

^① 《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502页。

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对这次会议解决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他指出：这也是解放思想的需要，目的正是向前看，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认为，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目前的经济管理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湮没一切。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还提出一个大政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①

根据与会同志要求，会议又延长两天，继续讨论闭幕会上的上述讲话。大家认为邓小平的讲话提出了当前实现历史转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明确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将起到长期的指导作用，也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

会议于12月15日结束。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打破“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把原本只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一次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重要准备的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实际上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1、143、152页。

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全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正式作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等战略决策。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经过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决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这次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

——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也为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决策，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确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开辟了新的道路。从此，改革开放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时代内容。

——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氛围中，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保障人民民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任务。会议不仅取得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而且也为全党继续解放思想，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纠正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方针，使党在全面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过程中能够坚持正确方向。

由于上述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由此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由此揭开序幕。党的十一届三